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信仰养成与践行路径探析

——以向警予为例

杨红星

(北方民族大学, 宁夏 银川 750021)

摘要: 向警予是早期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真诚追寻者、坚定信仰者和忠诚践行者。向警予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以爱国主义精神为源动力,以救国救民的朴素理想为方向指引,经过学生时代对科学与真理的不懈探求,在一系列改良与革命的实践探索中最终形成。在此基础上,向警予同其他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一道,通过推进信仰的中国化和大众化,始终不渝地坚持信仰、维护信仰和践行信仰,并最终实现“为信仰向死而生”的人生境界。

关键词: 向警予; 马克思主义信仰; 养成与践行

中图分类号: A8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4-3160 (2018) 01-0080-12
DOI:10.16479/j.cnki.cn43-1160/d.2018.01.010

向警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早期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真诚追寻者、坚定信仰者和忠诚践行者。通过对向警予马克思主义信仰养成与践行的基本梳理和解析,不仅可以约略揭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信仰追求的一般规律和大概路径,而且有助于说明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崛起和以马克思主义信仰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历史选择的必然结果。马克思主义是时代的召唤,是历史的选择。

理想目标: 孕育信仰的动力之源

信仰是“对某人或某种主张、主义、宗教极度相信和尊敬,拿来作为自己行动的榜样或指南”^[1]。可见,信仰不只是一种知识和观念,还体现为一种实践精神。一种信仰体系在提供给人们一种关于周围世界的解释的同时,也向人们提供一种向往和追求的理想目标。因此,“理想”属于信仰论的核心范畴,任何一种比较成熟的信仰皆有自己的

收稿日期: 2017-10-12

基金项目: 2015年全国高校中青年优秀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择优资助计划专项项目“《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叙事教学的理论与实践”(项目编号:15JDSZK048)。

作者简介: 杨红星,男,河北抚宁人,北方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南开大学高级访问学者,主要研究方向:中共党史与思想政治教育。

理想。^{[2]138}可见,信仰具有目标导向,体现着对现实生活的一种超越和对理想生活的追求。人们正是伴随着对理想目标的追求,而追寻和选定一种人生信仰的。当然,每个人最初的理想追求可能是朴素、简单而具体的,而最终选定的信仰体系中的理想目标是包含最初理想而超越最初理想的,是崇高、深刻而长远的。正如近代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信仰追求,他们大多怀揣救国救民的理想而走上救亡图存的革命之路,在尝试多种救国方案而屡屡失败之后,最后选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并以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为最终奋斗目标。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是马克思主义信仰体系的核心范畴,它不仅仅要实现国富民强的理想目标,而且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乃至实现人的真正自由和全面发展。作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卓越代表,向警予自儿时即对国家沦亡之状耳濡目染,由此立下救国救民之志,并逐步走上探寻信仰之路。

向警予是最早的女共产党员之一,在党的二大上,她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担任党中央第一任妇女部长,由此为妇女解放、为劳动大众解放、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一生。向警予出生于清末的一个富商家庭,相比于嗷嗷待哺的社会大众,她不用为生活所累,不必为衣食而忧。其父亲向瑞龄在年轻时依靠智慧与勤奋逐步崛起,成为溆浦当地财富和名望皆著的重要人物。向警予原名向俊贤,在家族中排行第九,幼时即得家庭和父兄的庇护和怜爱,但这位富家子弟全无骄纵蛮横的纨绔习气,从小知书明理,孝亲睦邻。难能可贵的是,向警予从小就没有贪恋荣华、坐享其成的思想,虽为女儿之身,却远离脂粉红妆,不仅以“代父从军”、保家卫国的花木兰为心中偶像,而且儿童时代即习文练武,立志成为“天下第一伟人”。^{[3]112}当然,向警予幼时这种思想特征既有时代背景的因素,也有家庭熏陶的因素,更与向警予卓尔不群的坚毅品质有着重要关联。对于一个处于社会主体话语之外的近代女性而言,敢于放弃固有的优渥生活环境而投入到跌宕起伏的社会激流当中,这本身就彰显了非同寻常的勇气和魄力。

理想是对未来的期许,是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在积贫积弱的近代中国,树立救国救民的人生理想,对向警予而言首先就意味着舍弃,舍弃所拥有的衣食无忧的优越生活;再者意味着追寻,追寻高远的社会理想,实现国富民强。而这一切,正是向警予所遵循的人生轨迹。从儿时的英雄情结到少年时代的外出游学,再到青年时期义无反顾的教育改造实验以及“五四”之后始终不渝的革命生涯,向警予一直心忧大众,一以贯之地以改善贫苦大众的生活境遇为奋斗目标。这位“盗火者”其实本可以过衣食富足、吟风弄月的富家小姐的生活,但物质生活和物质享受在向警予的人生追求中从来都不是其目标,与其思想上的慷慨激烈、不断追求进步相比较,向警予在生活中始终朴实无华,从不为俗物所累,不为物质所困。青少年时代的向警予不仅具有他人所不及的家庭条件,而且本人天生丽质、俊秀端庄,又知书明理,成为新式女性的代表,为当地权贵所倾慕。向警予曾有机会成为当时湘西军阀周则范的第二夫人,但她视之为奇耻大辱,而且不畏权势,亲自登门拒婚,毅然表示将“以身许国,终身不嫁”。无论对于现实物质生活的舍弃,还是对未来美好生活的追求,都闪现着理想主义的光芒,都是孕育信仰的重要力量。对于向警予而言,荣华富贵非其所愿,家国振兴才是其不懈追求。后来,这位坚强执着的女性为追求真理,踏上了勤工俭学、漂泊异国的艰辛之路,这种艰辛是物质上的,在

精神上却充实而激情澎湃，就在那种不平凡的信仰追求中，“向蔡同盟”建立，向警予既找到了真理，也找到了终身伴侣。可见，向警予是以对信仰的探寻，对理想的追求来规划自己人生道路的。

学业熏陶：信仰养成的前提和基础

信仰统摄人生的发展，它首先为人生提供一种世界观和价值观，从而使思想认识具有最大的明确性和稳定性。同时，信仰还为人生提供一种现实的生活目标和生活秩序，并嵌入人的行为和生活方式，从而充实生活并深度影响人生的发展方向。^{[2]252-269}人生即是一幕信仰大剧，没有信仰，人生即失去光华。信仰人人需要，但并非人人拥有。某种程度上，信仰也是一种能力，科学的健康的信仰塑造需要长时间的学习积累和社会践行。

信仰是对人生价值确定性的不懈追求，信仰的获得是人的知识、文化、能力和社会阅历综合作用和最终选择的结果。信仰不是一个人与生俱来的思想文化标签，需要在不断的学习和实践中获得思想源泉和价值滋养。马克思主义信仰首先体现为作为价值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科学性，是一门综合性的哲学社会科学，是一种世界观的理论。“理想信念的坚定，来自思想理论的坚定。”^[4]要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首先要能够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相关内容和方法，通晓唯物主义的世界图景，掌握辩证主义的思维方法。要掌握这一能力，需要通过辛勤不辍的学习来实现。同时，学习还能够培养分析和鉴别能力，以便在纷纭复杂和多元交错的信仰环境中找寻到真正值得追寻的科学信仰。向警予的学生时代正值具有启蒙价值的新文化运动发生，传统信仰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国人正处于价值观与信仰的求索、冲突、选择和重塑的转型时期。这一时期不仅存在着“孔教”、宗教和“科学主义”的争论与对峙，而且即使是脱颖而出的社会主义思潮，在科学社会主义即马克思主义之外也存在着空想社会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修正主义、新村主义、泛劳动主义、工读主义以及合作主义的区别。一时之间，思潮风起云涌，光怪陆离，为人们的信仰追寻与选择增加了难度。在这种情形之下，更需要具备基本的鉴别能力，结合中国国情找寻到最具现实性和科学性的科学信仰。

信仰是一生的事情，但学生时代至关重要，是确立和形成信仰的关键时期；信仰追求是一个主观学习的过程，青年时代是学习的最佳时期。向警予的青年时代主要在三所学校度过，分别为常德女子速成师范学堂、湖南省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和周南女校。辛亥革命前后，向警予离开家乡溆浦，来到常德女子速成师范学堂学习，入学后不久，即崭露头角，学问道德成为全校之冠。她学习刻苦，在课堂上正襟危坐，不苟言笑，不愿浪费分秒时间；做课时专心致志，一丝不苟，成绩优秀，作文常为同学传观。当时墨学研究备受推崇，盛极一时，而墨子被称作“我国社会第一伟人”。向警予青睐墨子的哲学，又常常把墨子的“兼爱”与西方资产阶级的博爱联系起来，虽不甚恰当，但体现出她渴求新知、力求变革的思想倾向。在日常生活中，向警予以其独特方式践行墨子主张，虽为巾帼，但见义勇为，乐于助人，颇有豪侠之气，因此被冠以“墨子”的绰号。^{[5]16-17}

1912年，向警予以优异成绩考取湖南省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在这所环境优雅、设备

先进且名师云集的女校中，向警予更加刻苦勤勉，不仅成绩优异，而且表现出非凡的组织活动能力。因其学业超群，胸襟坦荡，热情好助，受到师友一致赞赏。生活中，向警予严于律己，日省其身。难能可贵的是，她杂糅中西，在此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伦理价值观念。如她认为人要追求“精神自我”“义胜为胜，为成就”，并提出人要有统一而健全之人格，要“适应时代之思潮，深知人生的目的、理想、主义，对问题判断明确，努力强固，能排除他种抵抗而断行其所信。一遇事变，不特应付裕如，则有刚毅之气，不为威屈，不为物移”。^{[3]27-28}可见，通过在省立第一女子师范的学习，向警予已经认识到思想和精神追求的重要性，认为理想追求是健全人格的必要，要善于确立人生目标，追求人生之价值，只有这样，才能不为外物所困、外物所扰，遇到困难能够应付裕如，从容对待。向警予在省立第一女子师范读书期间，扎实储学备能，在学识和道德上都有了长足进步。

1914年，由于封建复辟势力的干涉和操控，向警予跟随朱剑凡校长转学至周南女校，并正式改名为“向警予”（之前为向俊贤）。在周南，向警予对学习努力程度更甚于前，常常是“三更灯火五更鸡”“日尤不足，继之以夜”。有时由于用功太久太过，以至“目辄矇眊，几不见物”，或者“脑衰神散”，头晕腹饥，“如戴大缶”。面对此种情形，向警予稍事休整，继续学习。^{[5]278-279}学习中，向警予从不局限于课堂所得的知识，而是广泛阅读各种书籍，博览兼收，深入研讨，对于浩荡发展的社会潮流有了更加科学客观的认识。新文化运动前后，政治舞台上“守旧”和“醉新”两种时弊，“守旧则反乎茹毛饮血”“醉新则化为黄发碧眼”。向警予持论公允，既反对夜郎自大的守旧思想，又反对妄自菲薄的“醉新”思想。她提出思想解放的强烈呼吁，反对“人云亦云，人否亦否，随俗浮沉，与时俯仰”，主张随机应变，因时制宜，“创造未来之社会”。^{[5]263}向警予在学生时代的广泛涉猎和勤奋学习既积淀了厚实知识文化基础，又培养了坚韧不拔的意志品质，同时增强了在纷纭复杂的社会变迁中明辨是非的能力。这些前期准备工作为向警予最终选定共产主义奠定了坚实基础。

爱国主义：信仰养成的精神渊源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家国情怀”往往使个人的价值追求与国家民族观照紧密相连。在救亡与启蒙成为近代中国时代主题的背景之下，有识之士的信仰追求不可避免地会烙印上浓浓的爱国主义色彩，这成为近代中国先进国人信仰追求的普遍特征，无论对于民主主义者还是对于马克思主义者皆如此。从这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讲，爱国主义是信仰之母，是近代以降仁人志士信仰追求的源动力。历史已经证明，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首先是彻底的爱国主义者，爱国主义精神是他们转向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在向警予对理想信念，对革命信仰的一贯追求中，爱国主义是基本的精神底色和情感基调。正因为胸怀祖国，关注苍生，以民族危亡为基本着眼点，以人民的自由解放为最终诉求，向警予才会在跌宕起伏的社会潮流中不断推动人生信仰与时俱进地蜕变与升华，直至确定以马克思主义为人生指导，以共产主义为理想目标。

向警予的爱国主义思想与其原生家庭有着重要关联，特别是受到其父兄的影响。

向父作为溆浦当地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对列强侵略和封建军阀统治的危害有着切身体验，因此有着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倾向。他向往国家富强，同情民主革命，这一点潜移默化地影响到其子女的成长。向警予兄弟中多位有着留学经历，大哥向仙铎更是“才华襟袍，名噪一时”，曾官费留学日本，先追随康有为、梁启超从事维新，后加入同盟会，参与民主革命斗争。向氏兄弟皆为开明人士，深知国家危亡之痛楚，他们身体力行的爱国行动成为向警予人生的重要指引。

向警予的爱国主义思想孕育于幼年时期。在文化典籍的阅读中，向警予对《离骚》和《木兰辞》情有独钟。在国事蜩螗的背景和氛围中，她对屈原的去国之痛有着情感上的朴素认同。她向往花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军的英雄壮举，也想体会“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的征战生活。“巾帼不让须眉”的豪情壮志和人生理想已在幼小的心灵里萌发，而这种人生理想是与保家卫国相联系的，正是这种爱国情愫成为追求信仰并最终走上革命征途的星星之火。^{[6]15}

学生时代是向警予爱国主义思想迅速发展的重要阶段。向警予在常德、长沙求学时，“从理论上对爱国主义有了深一步的了解”。^{[3]40}这一阶段，向警予爱国主义思想的发展，与两位老师的榜样作用密切相关。其中一位是爱国主义教育家徐特立。徐特立素怀教育救国之志，青年时期曾经断指血书，慷慨明誓，以激励青年反帝爱国。辛亥革命后，他坚持教育救国，先后在长沙多所学校任教，大力向学生灌输新思想新文化，被称为教育界的“长沙王”。徐特立的爱国思想对向警予影响至深，她曾谈到，“余闻徐先生言及平日诸先生所言，并古昔贤哲之论，与余自己之经验，益有省”^{[5]279}。另一位老师是朱剑凡。朱剑凡年少时深受爱国主义、民主主义思想的熏陶，曾留学日本并参与革命活动，后走上教育救国之路，倾其一生，毁家兴学。他对女子教育功勋尤著，所谓“湖南之以兴女学著者，自剑凡君始”^{[3]17}。1914年，由于复辟势力干涉校务，朱剑凡愤然辞去第一女师教职，全力支撑周南女校的发展。周南时期，向警予的爱国主义思想从理论到实践都得到了进一步提升。面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封建逆流，向警予首先以笔当戈，著文反袁，发忧国之思，抒爱国之志。她立足湖南，慨叹“湘流之咽鸣，灵均已渺”。在此基础上指出中国已濒于“国家陵夷，学绝道丧”之际，警示人们“我中华之前途，我卓尔之诸君不自负之，其孰负之？”向警予在文章中将斗争的矛头指向袁世凯反动政府，指出“国之危，以官邪也。官之失政，饥寒迫焉”。^{[5]262-273}在周南女校的反袁斗争中，向警予开始走出书斋，将爱国主义思想体现于具体的行动当中。袁世凯政府签订“二十一条”后，向警予与同学一道，四处宣传，在演讲中慷慨陈词，声泪俱下，阐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7]15}反袁斗争鼓舞了向警予的革命意志，提升了向警予的爱国精神，使她更深刻地认清了国之时势，由此开始抛弃“花木兰式”的英雄主义，决心顺应“世界潮流之所趋”，投身到拯救中华民族的伟大事业中，为“中华之前途”而努力奋斗。^{[7]18}

实践与探索：磨砺信仰的基本路径

信仰活动是一个人内心的精神建设和理想信念建设，是一个潜移默化的内化过程，是

思想意识的高度凝练。“真”信仰的养成需要外部实践锲而不舍的打磨、检验、确证和强化，“真”信仰经得起实践的检验，而且能够与个人和社会发展建立起同向共行的同一关系。从历史和实践来看，共产主义信仰是近代以来先进中国人在大浪淘沙式的社会变迁之后的客观选择，是连接历史、现实和未来并能够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价值追求和理想选择。恩格斯曾经提出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三个途径，即实践的途径、政治的途径和哲学的途径。^{[2]295-297}对于近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而言，主要通过社会和革命实践走上信仰共产主义的道路。向警予作为最早信仰共产主义的女性代表之一，就是通过执着不懈的实践活动最终确立起自己的“真”信仰。

向警予的人生信仰经历了由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转变。在这一过程中，她从一个改良的民主主义者发展成为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并最终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在这一选择和发展过程中，实践是最具影响力的衡量和决定因素。在早年的家庭生活和学習生涯中，受到父兄和师长的影响，当然更受到时代和社会环境的熏染，向警予开始接受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理想追求，这一追求首先体现为在家乡溆浦创办女学。女学的兴起是晚清中国的新鲜事物，在这一方面，湖南曾在全国引领风气之先，办学水平居于前列。向警予以知识女性身份创办女学，无疑使其具有他人所无法企及的得天独厚的优势和条件。向警予希冀以创办女学为契机，实现其教育救国和改良社会的目标。对于社会变革和整体发展而言，虽然教育救国具有片面修复的柔性特征，但对于封建礼教和传统习俗而言，创办女学无疑是一次正面宣战和有力抨击。在当时而言，这一理想追求无疑具有社会进步的时代特征。在创办女学过程中，向警予遭遇和克服了从校舍到经费再到师资的重重困难，最终学校正式开办并顺利运行。期间她以培育“自治心公共心”为目标，试图培养女性学生的自立精神和公民素质。在尊师爱生的基础上，向警予从教材编写到招募学生，事必躬亲，身体力行，并积极推进教育教学改革，使溆浦女学充满现代气息，成为宣传新思想，反对旧礼教，提倡男女平权的重要基地，为革命事业培养了众多后备人才。

总体而言，创办女学的教育改良实践取得了很大成效，但其影响毕竟只限于溆浦县城，是中国社会之一隅，无法撬动社会的整体发展。女学的各项措施在使人耳目一新的同时，也逐渐遭遇到越来越大的封建势力的阻挠。例如，本想通过组建“儿童清街团”改善地方公共卫生，使“数千年之积污”“从此一扫而尽”，无奈引起轩然大波，冷言冷语迅起，“因风翻浪”“舆论沸鼎”。^{[5]257}由此事，向警予看到了“国家的腐败与人心的陷溺”，认识到“要改变国家的现状，就要从挽救民心着手”。^{[6]28}某种程度上，向警予已经意识到这种教育改良的方式无以使国家实现富强，因此民主主义信仰也开始动摇。而接下来的五四运动的爆发，使向警予逐步抛弃了原来的民主主义的主张，开始以新的民主主义观念主导理想目标的追求。

五四运动是一次反帝反封建的群众性爱国运动，发源于北平但很快在全国形成示范效应，溆浦当地也掀起了不小的革命波澜。运动中向警予带领女校师生也开展了以反对日货、揭露政府卖国行径为主要内容的游行示威和舆论宣传，尤其是向警予发表的爱国演讲在当地引起巨大反响。在长达四五个小时的演讲中，向警予激情澎湃，鞭辟入里，令人振奋，让人信服。在新思想新文化的启迪下，向警予开始怀疑“教育救国”的路径是

否可行。社会是一整体，教育仅为一隅，如果只办教育，在根本上不改造社会，那么教育之成果可能会最终付之东流。^{[3]66}带着这一困惑和思考，向警予于1919年下半年加入了革命团体新民学会，成为该团体历史上最早的女会员。五四运动的实践参与使向警予开始寻求新的信仰人生。

加入新民学会之后，向警予对社会发展有了更加客观的认识。通过与其他女会员并肩作战，向警予在支持国货、平民教育和宣传妇女解放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从这些实践内容来看，向警予此时的关注点已经从单纯的女性教育转向了更加宽广的视域。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向警予在此时成为湖南女界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首创人，于1919年11月创办了湖南女子勤工俭学会。这一举动开始为众多知识女性寻求“真”信仰开辟了门径，向警予也成为其中最主要的践行者之一。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在某种程度上更像是一次信仰追寻运动。在赴法之前，向警予还未完全摆脱“教育救国”的思想，尚未形成对马克思主义的确切见解和主张，对于中国实行俄国道路和法国道路也没有明确认知，但她已经确信要承担起未来中国“根本改造”之大任。^{[5]7}有了这一认识，为获取“真”信仰提供了动力之源。参与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以后，向警予开始了寻求“真”信仰的实践旅程。1920年2月2日，向警予等人到达巴黎，之后由华法教育会安排来到蒙达尼女子公学。在这所学校，向警予一边补习法语，一边阅读法文版《共产党宣言》和《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著作。在此期间“向蔡同盟”建立，“向蔡同盟”不仅是挑战封建包办婚姻的行动宣言，而且是追求革命信仰道路上志同道合的政治联盟。在婚姻问题上，向警予曾经要“以身许国，终身不嫁”，是信仰的力量和马克思主义恋爱婚姻观促成了向警予的转变。“向蔡同盟”的建立是她所主张的“婚姻自决”的实现，标志着向警予的思想脉络和人生道路开启了新的航程，由此她开始由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3]94}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学习，向警予的思想实现了重要飞跃，最典型的特征即是开始与“旧我”决裂，并鲜明划清了“革命”与“改良”的界限。在《女子解放与改造的商榷》一文中，向警予把妇女解放与社会改造联系起来，指出“财产私有制”是“万恶之源”“这种制度，在理不应存在，在势不能存在”。^{[5]13}

1920年7月6日到10日，留法的新民学会会员召开了蒙达尼会议，会议确定了新民学会的方针为“改造中国与世界”，并明确提出以社会主义作为改造中国和世界的道路。在这次会议上，向警予协同蔡和森与主张实行无政府主义、工读主义、改良主义的意见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辩论，明确了俄式革命的正当性和必然性。从蒙达尼会议前后的情况可以看出，在“向蔡同盟”的信仰共同体中，向警予与蔡和森一道，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确立了无产阶级世界观，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6]56}蒙达尼会议后，向、蔡等人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以“要求生存权、求学权为社会革命之出发点”，领导勤工俭学学生展开了反对北洋军阀政府驻法公使馆的运动和占领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向警予还参与了周恩来、蔡和森等人领导的“拒款”斗争，她奔走呼号，揭露北洋军阀政府的反动卖国行径，最终使中法秘密借款被迫取消。在留法勤工俭学的波澜中，向警予“总是站在斗争的前列，是最先行动和处于领导地位的人物”。^{[6]65}留法期间，向警予是“致力于宣传共产主义的传道者”，同时也是留法

共产主义组织的创立者，是唯一的一个女创始人。这一组织为后来的中共旅欧支部正式成立奠定了基础。^{[3]105}

立足现实：强化信仰的必然选择

人生信仰的确立仅仅是一个重要的开端，此后还要不断地保持和维护。确立信仰很难，保持信仰也不易。保持信仰，一方面需要随着自己人生实践的发展，在不同的生活境遇中，对自己的信仰进行必要的调整，从而使信仰随时都以最有力的方式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在确立信仰之后，需要根据自己不同的生活经验来强化信仰，使自己和人生信仰更加坚定，更加成熟。^{[2]114}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的滚滚洪流中，有一些信念不坚定者虽起初确立起信仰，但在革命的熔炉中经不起考验，最终背弃信仰，甚至误入歧途，走上反革命的道路。这表明坚持、维护和与时俱进地强化信仰同样重要。

“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信仰，根植于现实又服务于现实。对这一科学信仰的尊崇，不能偏离时代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不能游离于历史发展的正常逻辑之外。”^[7] 向警予在法国接受马克思主义信仰，回国后与众多早期共产主义者一样，面临着如何将马克思主义信仰中国化以解决中国具体命题的重要命题。这就要求将马克思主义信仰由比较抽象、高远的信仰形式，转化为贯穿于其日常生活和学习工作中的行为准则与实践方式。对于中国而言，马克思主义毕竟是舶来品，是欧洲革命理论和实践的产物，要使其指导中国革命实践并发挥出最大效应，首先需要直面中国具体国情，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有机结合，从而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考量中国社会的内在机理和发展规律，厘定社会发展的未来方向和理性路径。对于向警予而言，还面临着信仰的进一步具体化和个人化问题，即如何依托信仰团体积极投身到具体的信仰活动中去，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去感悟信仰、建设信仰，从而达到坚持和强化信仰的目的。换句话说，向警予坚持和强化信仰，应立足国情和结合时代特征，并依据个人的社会实践和生活经验选择一个恰切的着力点，实现信仰的落地生根和信仰人生的发展壮大。向警予回国后以投身中共领导下的妇女解放运动为着眼点，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近代中国妇女工作实践相结合，在实践运行和理论阐释中有的放矢地深化和升华了马克思主义信仰。

1922年初，向警予回国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最早的女共产党员之一，由此她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有了组织依托，为信仰发展提供了丰厚的土壤。在1922年7月召开的中共二大上，向警予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并担任党中央第一任妇女部长，开始领导中国最早的无产阶级妇女运动。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发展历程中，女性长期遭受制度和文化的摧残和打击，处于社会底层，其生命活力和人生价值受到极大压抑。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以工农劳动妇女为主体的妇女解放运动异军突起，势不可挡，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的一支重要生力军。向警予就是其最早的和最卓越的领导者。^{[6]74}

“二七”惨案发生后，全国工人运动陷入低潮。1924年，向警予总结第一次工人运动的经验教训，成功领导了著名的上海丝厂女工大罢工和南阳烟厂罢工，使上海工人运动首先走出低潮，为中国妇女运动和工人运动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轰轰烈烈的国民大革命中，向警予积极发动广大妇女参加革命统一战线和国民会议促进会的活动，组

织妇女参加轰轰烈烈的五卅运动。在之后的省港大罢工中，除了通过各地妇女组织进行声援，还组织上海、广州、香港等地数千名女工，直接参与大罢工，成为一支重要力量。^{[6]114}在风起云涌的妇女解放运动中，向警予一方面以极大的精力领导无产阶级的劳动妇女运动；另一方面，以高度的斗争艺术同妇女运动中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作斗争，把千千万万妇女引向党所领导的革命洪流。^{[6]88}

作为妇女运动先驱者的向警予，不仅领导了女工运动，使女工罢工从经济斗争转入政治斗争，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而且在斗争中培养了大批妇女运动干部，引导她们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在向警予从1922年到1925年主持党中央妇女工作的几年间，妇女解放运动组织蓬勃发展。在1925年的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运动中，向警予号召并推动建立了中华女界联合会，这是全国各地妇女团体统一的联合组织。随后在党中央的支持下，向警予还组织了一个以劳动妇女为主体、团结各界妇女的革命妇女组织——妇女解放协会。“五卅”运动后，在全国革命高潮中，妇女解放协会会员达到30万人（一些地方称妇女联合会）。这使得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有了可靠的组织保证，并使中国妇女运动成为真正群众的运动。

此外，向警予在中央妇女部工作期间，还起草了妇女运动的一系列文件和决议，为中国的无产阶级妇女解放运动提供指导，为党的妇女工作提供方向指引。值得注意的是，在从事妇女解放运动的革命实践过程中，向警予还撰写了大量文章，总结革命经验教训，阐释妇女运动发展规律。向警予在妇女运动理论指导方面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向警予深化了对妇女问题的认识。她把妇女解放问题与政治问题联系起来，把妇女解放同整个劳动人民的解放事业联系起来，把妇女运动作为党领导下的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向警予指出，在北洋军阀专制统治和帝国主义残酷欺凌之下，中国已变成“兵匪的世界”，在这种情况下，“真正有觉悟的中国妇女，必然是一面参加政治改革运动；一面参加妇女解放运动”，因此要实现妇女解放，必须先实现劳动解放；要解决妇女问题，必须先解决政治问题。^{[3]167-168}其次，向警予高度评价了劳动妇女在妇女解放运动中的主力军作用，主张知识妇女到劳动妇女中去。向警予提出：“劳动妇女最有力量，最有奋斗革命的精神。”^{[5]99}她把劳动妇女运动称作“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锋”和“国民革命之前卫”，正因为如此，她主张知识妇女一定要到广大的劳动妇女中去，“眼光应时常注射到最下层妇女——工农妇女的生活”。^{[5]97}再次，向警予深刻剖析了资产阶级女权运动的阶级局限性，有力地批评了她们的错误主张。向警予指出，资产阶级女权运动一方面脱离广大劳动妇女，不知道女权运动要大多数妇女群众结合进行才有意义和作用；另一方面，她们把女子参政运动变成了她们个人升迁和争名夺利的工具。向警予的理论文章是马列主义妇女理论与中国妇女运动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沉沉女界报晓的第一声”，不久之后中国的妇女运动即蓬勃高涨，迎来了山鸣谷应、霞光满天的局面。中国妇女运动汇入了波澜壮阔的革命洪流。^{[6]124-125}

向死而生：捍卫信仰的终极诉求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信仰体系，包括唯物主义的的世界图景、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为

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自由而全面的人生追求。从根本上来讲，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政治信仰，是一种现实的、科学的、崇高的、健全的政治信仰，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指导思想和价值追求。在近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信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正因为马克思主义信仰具有反帝反封建和为人民谋幸福的革命性、先进性和正义性，近代中国信仰和践行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人往往遭遇各种反动势力的联合夹击、围剿和摧残，从而面临着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在一定程度上，革命即意味着牺牲，但这种牺牲是为人民而牺牲，重于泰山，死得其所，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丰碑上会镌刻下不朽的光华。一般而言，中国人本来避谈生死问题，但是国人也有“杀身成仁、舍生取义”“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价值考量和精神追求，亦即为正义的事业和崇高的理想追求可以不惜牺牲生命，从而获得生命价值的升华和意义的提升。在近代中国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伟大事业中，无数革命先烈正是秉持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追求，不畏艰险，不惧危难，甚至为革命抛洒热血，奉献生命，从而忠实捍卫了自己的信仰追求。向警予即是其中伟大的女性代表。

1925年10月，向警予暂时告别国内的革命事业，来到十月革命的策源地莫斯科，开始了在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者劳动大学的学习生涯。在一年多的学习中，向警予开阔了视野，进一步夯实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加深了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认识。1927年3月，向警予结束在“东大”的学习，来到“襟江带河，雄视全楚”的中心城市武汉，参与到大革命的滚滚洪流当中来。当时的武汉正处于国民党反动派策动反革命政变的前夕，工农运动如火如荼，革命形势空前高涨。但随着阶级矛盾的日益激化和全面显现，革命的潜在危机也在逐步酝酿滋生，所谓“黑云压城”“山雨欲来”。在这种错综复杂的革命形势之下，向警予先后在中共汉口市委宣传部和市总工会宣传部工作，在宣传工作之外，她还兼及工人运动以及青年和学生工作。1927年4月27日，向警予出席党的“五大”，在会上她敢于坚持原则，与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体现了其信仰的坚定性和高瞻远瞩的政治觉悟。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湖北的夏斗寅和湖南的徐克祥相继叛变革命，这是“宁汉合流”的信号，也是大革命失败的重要标志。由此全国陷入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之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运动遭到残酷镇压。据中共六大时的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31万多人，其中共产党员2.6万多人。^[8]在前所未有的困难之中，湖北的革命力量也遭受巨大打击。在大革命高潮时期，湖北省的党员曾发展到1.4万多人，有组织的工农群众达1千多万。武汉市的党员有8千多人，有组织的工农群众60余万。但大革命失败后，大批革命志士惨遭屠戮，再加之部分意志不坚定者胆怯退缩，临危变节，短短几个月，武汉的党员减少到原来的1/20，有组织的工人也只剩千余人。中国革命再次陷入低潮。^{[6]142}

向警予是声名卓著且公开身份的中共妇女领袖，在极其艰险的历史环境中，她不顾个人安危，拒绝从革命一线撤离，而且在关键时刻勇挑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的重担，坚持在敌人的白色恐怖区做地下斗争。这再次体现了其革命信仰的坚定性。正因为有向警予在危难中的坚持，才使众多革命者逃脱险境，或出国学习或转移他地，为革命保存和

培育了一批骨干力量，使江城地下斗争的烈火熊熊燃烧。^{[3]183}同时，为了在革命低潮中教育和鼓舞革命群众，向警予开始创办党的秘密刊物《大江》。在《大江特刊》（第一号）中，向警予写道：“《大江》愿做你们的伴侣，和你们永久共甘苦，同生死！《大江》愿做你们的明灯，在黑夜中照着你们走上光明的大路！”^{[5]257}在一定程度上这正是向警予当时心境和革命信仰的真实写照。由于党内“左”倾路线的影响和以城市为中心的年关暴动的失败，武汉在敌人的疯狂反扑下更加危险。随着党的地下机关和基层组织进一步遭到破坏，向警予随时面临被捕牺牲的危险。她也深切懂得革命工作的危险性，经常与党员和积极分子谈起，要正确对待生死，准备在必要时为革命献出一切。她说：“人总是要死的，但要看为什么而死，为革命、为人民而死是光荣的。”^{[6]149}

生与死是最为厚重的生命主题，生死观是人生观的极致，是人生观最高层次的体现。人本能地具有对死亡的恐惧，而且是最大的恐惧。因为死亡是对生命的否定，是生命进程的中止，而且是不能再次接续的中止，亦即生命的终结。可见，死亡是生命的反面，生命只要有感觉有意识，就必然会对死亡持一种恐惧和敌对的态度。但信仰的存在，往往可以使人进入一种超越功利的“无我”状态。“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4]“马克思主义将个人生命的不朽奠定在历史发展的无限性上。”^[9]历史和事实都已经证明，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可以为每一位革命者武装起坚如磐石的革命意志，让他们为了理想信念坦然面对生死，超越对非自然死亡的恐惧。1928年3月20日，向警予在叛徒出卖下被法租界巡捕房逮捕。被捕后，向警予坚持在监狱和法庭里与敌斗争。革命信仰经过烈火的淬炼愈益弥坚，她认为，革命者应该生命不息，奋斗不止；应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她珍惜生命但从容看待生死，她曾有过这样的生命告白：人都应该珍惜自己的生命，然而到了不能珍惜的时候，只有勇敢地牺牲生命。人迟早总是要死的，死也要死得明明白白，慷慨慨慨。^[10]信仰的出现，理想信念的追求在很大意义上可以使人克服对死亡的恐惧，科学的崇高的信仰会使这种价值体现得更加明显。^{[2]274}

在马克思主义信仰体系当中，人民是信仰者最高的信仰对象，人民利益最大范围和最大程度的实现，是信仰最高的价值目标。这种理想追求的崇高目标和神圣价值赋予革命者的牺牲以不朽的光辉。向警予曾经谈到“个人的牺牲不足惜，千万人的牺牲太可惜了”。在这里，千万人的集合就是人民，正是为了人民的有尊严有价值的生存，向警予甘心用个人的生命去换取，这就是信仰的力量。信仰能够调动人的精神潜力和物质能量，从而形成强大的力量。是的，是信仰武装了向警予的心灵，是信仰加固了向警予的意志，由此才会有从容赴死，才会有鞠躬尽瘁，才会有鬼门关口的坚定，才会有视死如归的坦然。

从向警予信仰人生的纵向发展来看，其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养成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多次选择和曲折发展的结果。而向警予投身社会实践，峰回路转之后最终选定马克思主义信仰，说明这不仅是向警予主观选择的结果，更重要的是时代背景和社会发展规律使然。在“五四”前后全民族面临新旧文化交替和多元信仰冲击的社会背景之下，马克思主义信仰最终脱颖而出，成为中国有识之士共同的价值追求和理想选择，这足以说明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崛起和以马克思主义信仰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历史选择的必

然结果。在追寻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众多人士当中，向警予只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代表，这些人物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不懈追求，最终找到了解决近代中国诸种社会问题的钥匙并开启了全新的社会发展道路。应该说，向警予的信仰养成体现着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信仰追寻的一般脉络和基本规律，包括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周恩来、瞿秋白、董必武、吴玉章等在内的一大批早期共产主义者，其信仰之路无疑都经历过多次的权衡与磨砺，最终殊途同归选择马克思主义并与时俱进地实现其中国化和推进其大众化。

通过对向警予信仰养成基本特征的考查，不难看出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培育、发展，与理想信念教育、爱国情操培养和坚持不懈的理论学习、社会实践密切相关，而且要深化强化和坚定践行马克思主义信仰，必须从根本上融入人民大众，通过贯彻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推动实现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

参考文献：

- [1] 吕叔湘,丁声树. 现代汉语词典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1: 1273.
- [2] 刘建军. 信仰追问 [M].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4.
- [3] 何鹤志. 向警予传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
- [4] 习近平. 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8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N]. 人民日报, 2016-10-22(2).
- [5] 向警予文集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1.
- [6] 戴绪恭. 向警予传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1.
- [7] 刘晓凯. 信仰的一般本质与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树立 [J]. 人文杂志, 2000(6): 34.
- [8]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 1 卷) [M].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1: 232.
- [9] 侯惠勤. 当代中国信仰问题的出路是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 [J]. 思想政治工作研究, 2011(4): 6.
- [10] 陈恒乔. 我和向警予大姐相处的日子 [M]. 南京大学学报, 1978(2): 104.

责任编辑: 曹桂芝